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廖晓晴

著

清史暨史学理论管窥

廖晓晴文集

廖晓晴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清史暨史学理论管窥

廖晓晴 著

廖晓晴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暨史学理论管窥·廖晓晴文集/廖晓晴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2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8221-7

I. ①清… II. ①廖… III. ①中国历史-清代-文集

IV. ①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0769号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清史暨史学理论管窥·廖晓晴文集

著 者 / 廖晓晴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丁 凡

责任编辑 / 高振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59367127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7.75 字 数: 463千字

版 次 /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8221-7

定 价 / 128.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辽宁社会科学院建院50周年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编委会

主 任 孙洪敏

副主任 梁启东 牟 岱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丹 王凯旋 孙 航 李天舒 李劲为 张天维

张思宁 张洪军 张献和 陈 萍 陈 爽 高 翔

韩 红 廖晓晴

作者简介

廖晓晴，1958年9月生于辽宁省沈阳市，祖籍四川省成都市。出身史学世家，受家庭影响，自幼立志史学事业。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历史文献学专业，获硕士学位。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辽宁省重点学科——明清史学术带头人，



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院学术带头人。长期以来，主要从事清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社会兼职：中国史学会理事、辽宁省史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会副理事长、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审组专家、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成员和成果评审组专家、沈阳市历史学会副理事长。

近年来，参加了国家清史工程的写作工作，所撰《王鉴传》成为传记组十二篇样稿之一。此外还撰写了《顺治康熙卷》人物传记九篇。主要著作：《史林巨匠——章学诚与史著》《畸形人生——中国历代宦官》《线条里的神韵——中国历代书法》。主编《清代帝王》《清史鉴知录》《清代文化名人传略》。

除学术著作之外，还在《光明日报》（理论版）、《辽宁日报》、《明清论丛》、《文史哲》、《社会科学战线》、《社会科学辑刊》、《满族研究》、《辽宁大学学报》、《满学论丛》和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刊物《曙光》等学术报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主要有《入关前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满族崛起的文化因素》《辽宁清文化的概念、精



神及保护开发》《清代辽宁流人与流人文化述论》《试论清初统治者的重武轻文意识》《清朝碑学的崛起》《清朝科举制之“馆阁体”》《清代文化史研究之我见》《章学诚“史意”说考辨》《清入关前实行科举制考论》《清前期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清代考据学与“四王”画派》《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杜佑与〈通典〉》《两汉“任子”问题之探讨》等。

总 序

时值壬辰，辽宁社会科学院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五十年征程。经过精心策划和编排，“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终呈其面，令人欣喜，从中不难窥见中国学术传统的映像和传承，感知社会科学工作者栉风沐雨、砥砺研磨的艰辛劳苦，雄立潮头、凯歌行进的激情与欢乐。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自有人类社会起，就开始了各种方式的对社会规律的探索，以叩问社会之道，寻求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些探索已成为人类探索自身的一部分。社会是人的活动域，有关这一场域的属性、构造、关系、机能等的规律性的研讨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内容。康德生动、精准而有趣地表述了自然、人、社会的关联：“大自然迫使人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人类结成社会以解决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或者说人类以社会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自然之属。从那一刻起，社会就作为人的结构的一部分而存在，它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以至于建设社会就是建设人自身，研究社会就是研究人自己，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寄托着人类的希望。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社会关联着人类的未来，在马克思的理想中，“人的社会”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理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类未来的期许成就了社会科学研究充类至尽的学术积淀，成就了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光昌流丽、兴旺发达。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学理传统，即要着眼于基础理论的



研究。人类社会代有其变，但有着基本的规律贯穿其间，对这些基本规律的研究延续在数千年来对人类社会的体认之中，其成果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深厚传统，凝聚为人类文明的珍贵积淀，影响着各个时代、各种体制下的社会建设。“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尚书·泰誓》）分门别类，彰显根本，对社会之道的追问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淀与守护，探索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和进步理念，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它的时代性，它由此建立起有差异的合法性、权威性，建立起与所处时代的血脉关联，并以此回应时代之问。时代精神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分析现实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必须与时代一同发展，葆有向新而有的敏锐性、先锋性，敏锐地在学理传统中整合进时代的质素，以此推进社会的积极发展。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要处理好八种关系，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求真与务实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关系、调查与研究的关系、科研与科普的关系、有为与有位的关系、治学与修身的关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做好本职工作，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又是一项脚踏实地的事业，它的理论不是面向空中筑楼阁，而是朝向坚实大地的实践结晶，呈具象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个人类共同体之中，与具体的生活、建设、发展相联结。它的应用性体现在作为社会管理、政策制定的智库，为具体的社会发展服务。由此，社会科学研究要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光荣传统。事实上，倡导调查研究是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固有的学术传统，早在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开展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孕育了现代形态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其卓越的成果不仅构架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架，而且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必须在调查研究中切实致力于发现、认识并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把自己打造成党和政府的智囊团。这是它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任何一种脱离了社会现实和应用的社会科学都是没有作为、没有生命力的。

辽宁社会科学院起步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1962年，其前身是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于改革开放之后，进而蔚为大观。五十春秋，筚路蓝缕，薪火传承，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奉献了弥足珍

贵的学术成果，并作为辽宁省委、省政府的智囊团，为推动辽宁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在此过程中，造就了一支学有专攻、术有所长的学者队伍，涌现出一批学术精英人才。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的“十一五”时期为例。辽宁社会科学院共完成学术成果 3500 项，出版著作 104 部，发表论文、研究报告 3266 篇，有 236 项成果获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等国家领导人及省部级领导批示，总字数达 5056 万字。诸多成果不仅显示了特有的学术价值，而且被转化为新政策、新举措付诸实施，带来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关专家成为辽宁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经济、金融学、社会学、民俗学、中国语言文学、东北边疆史地史、明清史、东北近现代史、区域经济学的学术带头人。

展望未来，刚刚踏入“十二五”时期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志在通过五年的努力，建成体制完善、机制灵活、人才聚集、学科布局合理、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在国内位居上游水平、在辽宁省内具有权威地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机构，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和传播中心、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咨询服务中心、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和信息交流中心、地方党委与政府名副其实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辽宁社会科学院因时而生，为民而谋；孜孜以求，唯兴国以为宏志。共襄五秩盛典，无不鼓舞欢欣，豪情满怀。往事可追，前程在望。感慨系之，谨以为序。

孙 永 吉

2012 年 7 月 6 日

自序

我出生在书香门第，今生能够与史学结缘，主要受家庭影响。父亲廖德清，成都人，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史地系，曾听过徐中舒教授讲授的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生班，导师是尚钺，辅导员是戴逸。毕业后到辽宁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的基础课程是《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专业课程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曾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教授职称。母亲刘敏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辽宁大学历史系任资料员，职称是副研究馆员。

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微微泛黄的古书，或是清末的线装书，或是大部头的《四部备要》，或是王云五编辑的薄薄的小书，父亲经常翻阅这些书。出于好奇，我也偶尔偷看，然而当时根本看不懂，好似天书一般，有些书的内封上还会绘有古人射箭的图案，更觉神秘。正因为感觉神秘，心里反而十分向往，很想知道里面究竟写些什么！既然这些古书暂时看不懂，我就转而看一些历史故事，如蔡东藩撰写的《前汉演义》《后汉演义》，以及明清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当时读这些历史故事书也不是很顺利的，主要是不认识繁体字，但经过一番艰苦的磨炼之后，在小学毕业之前基本过了这一关。

我小学是在沈阳市宁山路小学就读的，班主任老师郑玉琦，这是我要一生铭记的第一位老师。记得在小学四年级一次作文中，郑老师批改后唯独没有把作文本返还给我，我正困惑间，郑老师却把我的作文作为范文在全班宣读，此后我信心倍增，益加努力，作文在全班乃至全年级宣读成为常例，于是在同学间便有了个绰号——“大学生”。家中尚未来得及翻看的《写作知识》一书，因此也被同学的家长借去，错失阅读机会。现在看来，小学作文毛病多多，与其说我在小学四年级时开始显露了一些写作方面的天赋，不如说受到老师的激励作用更大。我至今认为，孩子教育不但需要



批评，更需要鼓励。

上了中学之后，我开始自学古诗词，当时能够见到的就是《毛主席诗词》。在一次作文中，我就模仿毛主席的《西江月》词律写了一首，结果被年级组长老师叫到办公室，问我是在哪儿抄的，我说是我自己写的，年级组长老师竟然说我不诚实，认为这样的诗词不是这个年龄段孩子能写的。我有口难辩，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还有一次在儒法斗争宣讲会上，我因偷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简本）》，被老师发现，说我是走“白专”道路，入团时间延缓一期，说是考验。在中学期间唯一能令我聊以自慰的是，在母亲工作的资料室找到了王力撰写的《古代汉语》，得到这部书真是如获至宝，我当时想这是读懂家中古书的津梁，因此每天早上都反复背诵，终于在中学毕业之前，我背熟了四册中的前三册，这为我日后阅读古文献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77年8月9日，作为最后一批知青，我来到辽宁省开原县三家子公社南英城子大队插队。知青的劳动和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为了好好干，早日抽调回城，晚上收割归来之后，经常都顾不上洗脚，便去磨镰刀，镰刀磨得飞快，甚至可以刮胡子，以便明天收割时不落后。冬天要戴着棉帽子睡觉，第二天清晨起来，眉毛上都结了白霜。对于这段经历，我现在的看法是：它是用多少金钱也买不来的，因为这使我真正认识了社会，使我有思考问题的深度，在后来的治学和社会交往中皆受益匪浅，然而再回到农村的那个日子里也是不肯的，因为毕竟是学非所用。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之后，我知道自己能考上，在乡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终于在1979年以全省文科第66名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北京师范大学虽名为“师范”，但实际上是以培养研究人才为宗旨的。入校后，刘家和老师给我们讲授世界古代史，开始的第一句话便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是培养历史学家的，而不是一般的历史教师。”让我们同学都以成为历史学家为终身追求目标。黎虎老师讲授先秦史，期末考试时，不采取传统的以背书为主要内容的闭卷形式，而是实行撰写论文的考试方法，着重培养同学们综合研究能力。唐赞功老师讲授秦汉史，期末亦实行撰写论文的考试方法，他曾说：“大学主要培养同学们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至于历史知识内容，书架上的书写得最为详细，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去背。”何兹全老师是我国魏晋封建说的代表学者，讲授中国经济史，

当时还有一些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师来听课。何老师在课上每人发一篇《史记·货殖列传》的打印稿，要求在阅读十五分钟之后，提出问题。何老师解释说，这主要是考查同学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在同等的时间和同一篇文章中力争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问题。现在想起来，真是循循善诱，获益匪浅。

1983年大学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四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我又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历史文献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黄苇教授。

以上这些老师，都是我终生不能忘记的人。父母生育了我身，老师却塑造了我的灵魂。我平生最敬重的就是我的老师。

1990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古籍编辑室工作，1992年调入辽宁社会科学院，先是在党史研究所工作，1996年又调入历史研究所工作。进入历史研究所工作之后，所长关嘉禄老师积极培养我，使我在政治和学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张玉兴老师也十分关心我，经常鼓励我要刻苦治学，并给了我很多的清史资料。

时光荏苒，屈指一算，来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已有23年。这部《文集》就是在这23年期间取得的主要科研成果。从内容上看，这部《文集》收录的40余篇文章可以分为四部分，即清史、史学理论、其他史论和书评。

在清史文章部分中，又可以细分为两类，即清代东北史和清代文化史。

关于清代东北史研究的文章主要有《入关前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清入关前实行科举制考论》《满族崛起的文化因素》《试论清初统治者的重武轻文意识》《辽宁清文化的概念、精神及保护开发》《清代辽宁流人与流人文化述论》《清初著名爱国文化流人——函可和尚》《郝浴及其银冈书院》《清代盛京、吉林、宁古塔官参局设立时间考》《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嬗变》《急功近利的清朝参务》《清代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参事略》《乾隆五十九年参务案》《清朝在东北地区实行的参务政策》和《清朝对偷参活动的惩治》等。

众所周知，清朝崛起于辽宁，即所谓“龙兴之地”。为了凸显地方特色，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自建院和建所以来，一直把清代东北史，或称清前史，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笔者自1996年进入历史研究所以来，继承了本所老一辈学者的学科传统，从事这一领域的课题研究。上述文章又可分为三个问题，即关于打造辽宁清文化品牌的问题，关于清代辽



宁文化流人的问题和关于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问题。

关于清代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文章有《清代文化史研究之我见》《清代碑学的崛起》《清代科举制之“馆阁体”》《清代前期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清代考据学与“四王”画派》《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等。

选择这一研究领域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清代文化史是目前中国文化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亟待加强。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文化热，在史学界也兴起了中国文化史研究热。在这场文化史研究的热潮之中，中国文化通史与各断代文化史如雨后春笋，纷纷问世。从各断代文化史的研究来看，迄今为止，几乎各个朝代的文化史均已出版，唯独清代文化史尚付阙如。因此笔者亦选择了这一研究领域，争取有所建树。其二，笔者认为：如将清代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与文化史联系起来，进行综合性考察，必将推动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例如，清朝在以武力统一全国之后，为了消除在汉族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反清复明意识，采取了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两面政策。一方面搞“文字狱”，以残酷的手段镇压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开“博学鸿词科”和明史馆，编纂《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图书，吸纳知识分子参加，给他们以出路。同时清朝还利用清初启蒙思想家顾炎武开创的考据学，泯灭其“经世致用”的宗旨，倡导为考据而考据的复古主义学风，最终将考据学派转变成成为清朝粉饰太平的工具。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做文化领域里的考察，就很难知道清朝统治者实行的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两面政策是否得到落实？如果确实得到落实，那么落实的程度如何？在落实的过程中，具体情形如何？皆无从得知。本人撰写的《清代前期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清代考据学与“四王”画派》和《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三篇文章，便回答了这个问题。通过这三篇文章，我们就会对清朝统治者实行的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两面政策有了更为具体明确的认识，同时在清代绘画领域、书法领域、篆刻领域，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也找到了影响它们发生和发展的政治原因，从而深化了这些文化领域的主题，正所谓彼此促进，相得益彰。

关于史学理论部分，有关的文章主要有《章学诚“史意”说考辨》《论章学诚的“贵专家之学”》《刘知几与章学诚》《杜佑与〈通典〉》《民国时期方志学理论述评》等。

由于笔者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的研究方向是中国历史文献学，因而在

这一研究领域亦有所涉猎。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是本领域里研究的重点。章学诚是清代最伟大的史学理论家和方志学家。他的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主要反映在《文史通义》一书中,《文史通义》的内容很丰富,但其基本精神是主张“史意”一说。章氏虽然一生力主“史意”之说,但对“史意”的概念从未做过说明,因此引起史学界的纷争,迄今没有达成共识。如果概念不明确,便会直接影响对章氏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的理解和解释。鉴于此,笔者撰写的《章学诚“史意”说考辨》一文,突破前人就章氏的某段有关语句进行推断“史意”的办法,采取认真考察章氏在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上的各项具体主张的方式,诸如:“史意”与历史编纂学、“史意”与校讎、“史意”与史评和“史意”与修志等各个方面,由下至上地综合分析出章氏的史意内涵与外延,最终得出“史意”乃是探索事物发展过程中规律性认识的结论。应当说这为推动史学理论和方志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一点贡献。

关于其他部分的史学论文主要有《两汉“任子”问题之探讨》《抗日战争的起点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上限应当分开》《“不抵抗”政策是蒋家王朝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沈阳审判与纽伦堡、东京、南京审判比较研究》《日本在东北地区实施的鸦片侵略政策——以抚顺千金寨地区鸦片毒品贩卖活动为中心》《辽海文化之我见》等。在这些论文中,《两汉“任子”问题之探讨》是本人的大学毕业论文,也是最早发表的论文。其他几篇论文都是本人由于特殊机缘而撰写的论文。

关于书评部分的论文主要有《中国区域史的一部扛鼎之作——评〈中国东北史〉》《清代东北满族史的一部拓荒之作——〈清代东北边疆的满族〉评介》《一部亚文化专题史的填补空白之作——评曲彦斌著〈中国乞丐史〉》《人书俱老 德艺双馨——记我的书法老师祁毓麟先生》。以上这些书评,大都是受人之邀、应人之请而撰写的文章,有必要一提的是,最后的一篇文章是为介绍我的书法老师祁毓麟先生而写的。我平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史学,二是书法。我的史学老师较多,而书法老师只此一位。祁毓麟先生是辽宁省书法界的元老,自1991年初有缘结识祁老师并成为弟子,至今已有24年矣!是祁老师把我引入学习书法艺术的正途,使我在书法艺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故借此文集一角,以铭记师恩。

除了以上收入《文集》的文章之外,笔者还参加了国家清史工程的工作,撰写了《王鉴传》《沙尔虎达传》《尼堪传》《李国翰传》《屯齐传》



《罗托传》《豪格传》《林起龙传》《阎应元、陈明遇传》和《龚鼎孳传》共10篇传记，其中《王鉴传》被列为撰写画家传记的样稿。因为清史工程至今尚未结项，故没有收入《文集》之中。

没有收入《文集》之中的还有著作。本人共撰写三部著作，即《史林巨匠——章学诚与史著》（辽宁人民出版社、辽海出版社，1997）、《畸形人生——中国历代宦官》（辽海出版社，2001）、《线条里的神韵——中国历代书法》（辽海出版社，1998）。主编了三部著作，即《清代帝王》（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清史鉴知录》（辽海出版社，2010）、《清代文化名人传略》（辽海出版社，2015）。

值此《文集》出版之际，自己并无太多的欣喜之情，相反更多的是感到汗颜和遗憾，因为这和我年轻时代的期望相去较远。我是学习清史的，记得当初读到清代的考据学风时，认为那个时代的学者实在是太僵化和愚痴了，做了一生舍本逐末的学问。然而我们这一代学者又当如何呢？浮躁之风充斥着整个学术界，追逐高额利润的课题成了人们治学的动力和风向标，由此催生了一批擅长课题论证的“专业户”，结项时发表的成果质量却很差；每年一度的量化打分成了衡量人们科研成果的主要评价体系和评职定级的主要依据，将学者们的时间一段一段地人为分割开来，结果只能是出现一大批科研成果的早产儿，庸品多而精品少。有人说：科研就是将白纸变成废纸的过程，此言虽是调侃，但并非一点道理没有。以此与清代的考据学风相较，考据尚能得到一些真知，而浮躁则一无可取。笔者生当此世，亦不得不为稻粱谋，面对现实，因此应时之作多而沉潜之作少。不要说与古代学者相比，就是与上一辈学者相比，也是功底浅薄，自愧不如。虽然如此，但这些文章毕竟是自己的一生心血所注和精神轨迹所在。清初画家王鉴暮年时，曾在自己的画上题曰：“倘遇知己不鄙弃而收之，余魂魄犹依依于旁也。”我虽不能与王鉴相比，但此刻的心情却有些许相通之处。值此辽宁社会科学院为本单位学者资助出版文集，亦属难能可贵之善举，使我得以借此载体，将几十年的史学研究所得寄存于世间，也算是心有所寄，意有所慰吧。

目 录

CONTENTS

清史篇

清代文化史研究之我见	3
清代前期文化领域里的复古主义倾向	11
清代碑学的崛起	21
任职勤勉、持己清洁的“贤相”吴琬	34
清代科举制之“馆阁体”	38
清初考据学与“四王”画派	68
清代考据学与篆刻艺术的复兴	86
入关前清统治者的文化政策	98
满族崛起的文化因素	101
试论清初统治者的重武轻文意识	111
清代辽宁流人与流人文化述论	122
辽宁清文化的概念、精神及保护开发	135
试析清代东北流人文化的内涵	140
清初著名爱国文化流人	
——函可和尚	149
郝浴及其银冈书院	154
清入关前实行科举制考论	164
清代盛京、吉林、宁古塔官参局设立时间考	177
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嬗变	179
乾隆五十九年参务案	198